



# 《文艺月刊》（1930—1941）研究

王晶 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艺月刊》(1930—1941) 研究/王晶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 - 7 - 5668 - 2408 - 0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1930—1941  
IV. ①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6938 号

《文艺月刊》(1930—1941) 研究

WENYI YUEKAN (1930—1941) YANJIU

著 者: 王 晶

.....

出 版 人: 徐义雄

策划编辑: 杜小陆

责任编辑: 亢东昌

责任校对: 刘雨婷 林 琼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31

营销部 (8620) 85225234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良弓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4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名人專家的演說

中國文藝社徵求社員

中國文藝月刊徵稿啟

文藝月刊創刊號

正書局式正開幕大廉價

# 文藝月刊

全民族抗戰文藝專號

本书获得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术出版资金资助，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2YJC751079）成果

# 目 录

|                                |     |
|--------------------------------|-----|
| 绪 论 .....                      | 1   |
| 第一章 《文艺月刊》创刊发行的背景 .....        | 6   |
| 第一节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艺期刊出版 .....   | 6   |
| 第二节 1930：“左”“右”对峙的新期刊 .....    | 10  |
| 第三节 1930：“左”“右”之间的新期刊 .....    | 19  |
| 第二章 中国文艺社的《文艺月刊》 .....         | 28  |
| 第一节 主办者中国文艺社 .....             | 28  |
| 第二节 不同时期的主编 .....              | 49  |
| 第三节 作者稿源和出版发行 .....            | 70  |
| 第三章 《文艺月刊》的文学创作 .....          | 80  |
| 第一节 政治和历史语境中的民族认同 .....        | 80  |
| 第二节 民生苦难和社会批判中的人文关怀 .....      | 101 |
| 第四章 《文艺月刊》的文学批评 .....          | 115 |
| 第一节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王平陵个案研究 .....   | 117 |
| 第二节 现实认识与艺术表现的统一：韩侍桁个案研究 ..... | 125 |
| 结 语 .....                      | 139 |
| 附 录 .....                      | 142 |
| 附录一 王平陵主要文艺活动年表 .....          | 142 |

《文艺月刊》(1930—1941) 研究

|                           |     |
|---------------------------|-----|
| 附录二 《文艺月刊》主要作家作品一览表 ..... | 154 |
| 附录三 《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目录 .....   | 188 |
| 参考文献 .....                | 209 |
| 后 记 .....                 | 219 |

## 绪 论

出于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出于“重写文学史”的需要，从期刊史料入手，对文学史进行考查和研究，已经逐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热门模式。任何“史”的存在都依靠叙述。文学史由什么人来叙述，选择什么材料来叙述，具体怎样来叙述，这些都会影响甚至决定着受众眼里文学史的基本面目。叙述的权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大，它可以“改变”历史也可能“塑造”历史，它可以发现被遮蔽的历史存在，也可能遮蔽客观存在的历史。

历史的客观流逝性和叙述的主观话语性，决定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一种全面完善的、永恒规范的历史叙述，我们与历史原貌总是有着一定的距离。也正是因为这种历史叙述的相对性，使得“重写文学史”成为必要，使得“返回历史现场”变得重要。

人们逐渐意识到对报刊出版进行考查，是熟悉把握文学史材料的有效途径。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发展、繁荣与中国近现代期刊的产生、发展、繁荣基本上同步，基于这种特殊的关系，不管是出于文学史叙述尽可能接近历史本相的尝试，还是表达当代人对文学历史和现实的评价，我们都必须重视文学期刊原始材料的价值，关注影响期刊的各种要素。

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英在编撰《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时，就注意到了现代文学期刊的重要性，其中的杂志编目是“五四”以来比较系统的文学期刊编目。1949年后通过影印的方式整理保存了大量现代文学报刊史料，其中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主要是1949年前革命文学刊物的影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陆续影印了左翼文艺刊物和其他革命刊物40多种。20世纪80年代重印了一批涉及面更广的文学期刊，集中在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各社团、流派的刊物，主要有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期刊专辑》和《抗战文学期刊选辑》。就期刊目录而言，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唐沅等编，1988年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以及《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续一）》（王大明、文天行、廖全京编，1984年版和1986年版）、上



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吴俊、李今、刘晓丽等主编,2010年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域的不断拓宽,作为历史原材料的期刊日益受到重视,且逐渐掀起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从史料的钩沉向期刊本身、传媒和文学的关系等多个方面的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期刊研究全面繁荣,成为生机勃勃的学术生长点,国内文艺刊物和杂志都发表了大量有关此方面的论文。成批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把期刊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以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为例,以“现代文学期刊”为搜索主题,可以找到110多篇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和7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最初,期刊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随着研究视野的扩大,除了经常关注的热点期刊,又出现了以不同划分标准来定义的系列期刊研究,如以文学流派来划分,以文学社团来划分等;而且一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刊物,如《青鹤》《良友》及“上海小报”等,因为阅读条件的改善也进入人们视野。

整体看来,由于期刊研究方法的不同,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史料整理爬梳、思想文化研究和传播媒介研究三大类。姜德明的《现代文学期刊拾零》,钱振纲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社团与报刊考辨》,封世辉的《东北沦陷区文艺期刊钩沉》和《华东沦陷区文艺期刊概述》等属于史料整理爬梳类。思想文化研究类的有很多,如陈平原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刘震的《〈新青年〉与“公共空间”——以〈新青年〉“通信”栏目为中心的考察》,沈卫威的《从〈新青年〉到〈新潮〉——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王晓明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殷克勤的《简论〈小说月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从传播媒介研究的角度考察,也为期刊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户。例如:钱理群的《〈万象〉杂志中的师陀的长篇小说〈荒野〉》,吴福辉的《作为文学(商品)生产的海派期刊》和《海派文学与现代媒体: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颜浩的《民间化:现代同人杂志的出版策略——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杂志和北新书局》,左文、毕艳的《论左联期刊的非常态表征》,陈方竞的《学府与报刊出版:中国新文学发生发展中“症结”透视》,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近年来,围绕着《申报》及其《自由谈》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益世报》文艺副刊和《解放日报·文艺》《学衡》《甲寅》《论语》《七月》《小说月报》《语丝》《现代》《礼拜六》《紫罗兰》《新潮》《抗战文艺》《文艺复兴》《文学季

刊》《文学杂志》等众多流派报刊的不同角度的研究比较火热。

期刊研究的有关专著也在不断涌现,如陈平原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应国靖的《现代文学期刊漫话》,周葱秀、涂名的《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杨义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周海波的《传媒时代的文学》和《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刘增人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杨联芬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马永强的《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张生的《时代的万华镜:从〈现代〉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杜惠敏的《晚清主要小说期刊译作研究(1901—1911)》,黄群英的《现代四川期刊文学研究》,韩晗的《可叙述的现代性:期刊史料、大众传播与中国文学现代体制(1919—1949)》,李相银的《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陈建功的《百年中文文学期刊图典》等。

与上述期刊研究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甚少有人关注右翼文艺期刊,其实同样受人冷落的还有包含了右翼文艺期刊在内的中国右翼文艺。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国民党的右翼文学才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86年南京师范大学几位教师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了一组相关的研究文章。1989年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一书中,潘颂德提及了几种右翼文艺期刊。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研究的自由氛围更为浓厚,国民党的右翼文艺研究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多篇相关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选题。博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钱振纲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研究》,首次比较全面地对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中的代表性文艺理论和创作进行了梳理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倪伟的《1928—1937年国民党文学研究》,后来他又在这个课题上继续学术积累,在其博士后出站时有论著《“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1929—19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学运动》。复旦大学周云鹏的《民族主义文学论》,进一步推动了右翼文艺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毕艳的《三十年代右翼文艺期刊》,主要从宏观上对20世纪30年代40多种右翼文艺期刊进行了重新挖掘和审视,力图真实再现右翼文艺期刊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文学存在的本来面目。华东师范大学牟泽雄的《(1927~1937)国民党的文艺统制》则从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对文艺政策、社团媒介、审查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西南大学汪翠华的《战时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晴雨表》,四川师范大学付娟的《〈中央日报·青白〉副刊(1929—1930)与国民党文艺运动》,西南大学周津菁的《政治

权力与话剧活动——论战时重庆“雾季公演”》等。其他相关的期刊、会议论文有十余篇。

由此可见，与其他文学（期刊）比较，国民党的右翼文学还有广阔的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的空间。涉足这一研究领域，有一份必须得到重视的期刊——《文艺月刊》，因为它属于右翼文坛中持续时间较长、在现代文坛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本书选择《文艺月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通过右翼文艺期刊的个案研究，开拓三十年代甚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深化国民党右翼文学的研究。

三十年代文学的主流是左翼文学，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国民党右翼文学同样是一只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而且，右翼文学和左翼文学以及其他各类文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通过相关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文学场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原始期刊资料入手，努力回到文学史现场，了解文学原生态，是加强目前还比较薄弱的右翼文学研究的务实、科学的途径。

第二，通过微观层面的期刊个案研究，开发利用文学史原始资料，尽可能开发出目前备受冷落的右翼文艺期刊的潜在价值。

整理和研究这些原始期刊，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挽救珍贵的文学史料。由于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右翼文艺期刊丢失、损害得比较多，这给整理研究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但也从中凸显了相关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同时，正因为长期备受冷落和遮蔽，所以发掘出文学新亮点的可能性较大，比如一些创作丰富的右翼作家以及右倾文人的作品情况等，《文艺月刊》就是闪烁着可贵光芒的此类期刊的典型代表。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或者根据被冷落期刊所反映的新信息对旧资料进行重新阐释和理性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文学研究补充新鲜血液。

第三，通过典型期刊个案的研究，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文艺政策和活动；通过再现期刊个案产生、发展、消亡的全过程，探讨文艺传媒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以及相互影响，从而为今天的文学传媒（尤其是官方文艺传媒）生存提供有益的借鉴。

三十年代的文艺期刊是各种文学阵营作家发表文艺观念的重要载体，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艺期刊被赋予了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重要使命。《文艺月刊》显示出来的并非右翼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过早地销声匿迹，而是此项运动不断演变至多元化的过程，其文艺思潮开启了卢沟桥事变后抗战文学成为主流的先河。以《文艺月刊》为文本背景，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角度的扫描中,可以探视右翼文学生存发展的过程,从而尽可能地了解文学在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应有的文化功能及其生成发展的规律特点。

笔者着手研究之时,国民党右翼文学相关研究对《文艺月刊》有不同程度涉及,而对《文艺月刊》的专门研究如下:

《〈文艺月刊〉研究》,郑蕾,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

《〈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研究》,王美花,重庆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

《张力与缝隙:民族话语中的文学表达——对〈文艺月刊〉(1930—1937)话语分析》,韩雪林,《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时间与空间:民族话语的伺机表达——〈文艺月刊〉(1930—1937)编辑主体分析》,韩雪林,《文艺争鸣》,2012年第13期。

两篇硕士学位论文针对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文艺月刊》进行了基本的史料梳理,韩雪林的两篇论文则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历史背景下,运用话语研究范式,对《文艺月刊》的刊物特征、编辑主体进行了学理分析。

后来有人持续从不同角度关注了该刊物,主要有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伟博士学位论文:《〈文艺月刊〉(1930—1941)中的民族话语》,2016年福建师范大学袁小媛硕士学位论文:《在西方尺度与民族立场间:〈文艺月刊〉译介研究(1930—1937)》。

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采取实证的方法,继续个人化的研究。首先仍然是全面深入地整理爬梳相关原始材料,因为《文艺月刊》前后历时12年,共计二百万字左右的篇幅内容,全刊内涵非常丰富,尚需进一步挖掘开发。其次,通过期刊文本阅读,在思想文化方面,主要使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把《文艺月刊》和三十年代不同类型的期刊以及同一文艺阵营内不同编辑策略的期刊进行对比分析,展现出《文艺月刊》作为右翼期刊温和儒雅、兼容并蓄的特殊风貌,努力把《文艺月刊》的史料发掘和文学本体、文学流派、不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的文艺选择联系起来,尽力表现出当时文坛丰富复杂的活动空间,探讨围绕着这份杂志的文人们在三十年代的文学行动及其成就,揭示《文艺月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

## 第一章 《文艺月刊》创刊发行的背景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期刊出版

“30年代是中国新文学的收获期。始终作为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各种社团和发表作品的各种期刊，在这时期也步入花季，达到繁盛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整个30年代，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革命、中华民族命运的转化与变幻和文学思潮的多元性，全国各地先后出现的新文学社团达240余个，文学期刊和报纸文艺副刊达1100余种。”<sup>①</sup>在1933—1934年，还出现了“杂志年”的热闹现象。茅盾在《所谓“杂志年”》一文中描述道：“有人估计，目前全中国约有各种性质的定期刊三百余种，其中倒有百分之八十出版在上海。”<sup>②</sup>阿英在《杂志年》一文记录了当时书市的相对惨淡，“单行本的市面，却跌落得很厉害。在往年，寒暑假期间，是书店的‘清淡月’，而现在呢，除掉杂志而外，是每个月都成为清淡的了。许多书店，停止了单行本的印行，即使要出，也是以既成的大作家的作品为限”。<sup>③</sup>

造成“杂志年”热闹景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从杂志自身来看，有其固有的特色优势。胡道静在《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杂志界》中说：“好些日子以来，报纸上的巨幅杂志广告是每天刺激着观众的神经；许多的书店里也专开着杂志部，搜集了全国重要的定期刊物陈列着经售”；“杂志渐夺单行本书籍之席，这是出版界普遍的现象。因为杂志有两大优点：（一）每册内包含许多的东西，使读者不觉单调；即使专门性质的杂志，内中仍有许多人的文章：尤其是一册普通的杂志，自庄严的论文至谐谑的小品都有，自然比看一本整个系统的书有兴味。（二）杂志是定期出版的，每期可载

---

① 郭志刚、李岫主编：《中国三十年代文学发展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② 茅盾（笔名兰）：《所谓“杂志年”》，《文学》第3卷第2号，1934年8月。

③ 阿英：《杂志年》，《夜航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63页。

着最近发生的事情，论文也便于利用最新的资料。”<sup>①</sup> 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也显而易见。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萧条逐步蔓延到其他主要西方国家，最终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受此影响，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贫弱，读者的购买力相当有限，相对于图书，杂志价格低廉，也就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青睐。这种情况，当时的出版界也认识到了，如张静庐所说：“农村的破产，都市的凋敝，读者的购买力薄弱得很，花买一本新书的钱，可以换到许多本自己所喜欢的杂志。”<sup>②</sup> 出版界不约而同地把出版重点转向杂志，是摆脱困境努力营利的必然。此外，也有政治上的原因。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相应地在文化领域施行了一整套的文化方略，而杂志相对灵活的出版经营方式，更适合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存。

国民党政府颁布禁书令和图书杂志审查法，对书刊市场进行严厉查禁和苛刻审查，形成对文艺创作发展的巨大障碍。在1930年底，国民党中宣部向中央递交的审查出版物的“内部报告”中，就曾直言不讳、洋洋得意地讲述进步书籍的出版“渐次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本部以前，对于此类书籍的发行，采取放任主义，少加查禁”，而“在国内一班青年，又多喜新务奇，争相购阅，以为时髦。而各小书店以其有利可图，乃皆相索从事于此种书籍之发行，故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但是最近数月以来，本部审查严密，极力取缔，各小书店已咸具戒心，不敢冒险，以亏血本了”。<sup>③</sup> 左翼文学杂志受此冲击最大，他们的刊物虽常遭查禁，但也不屈不挠，换个刊名、换个出版社名继续出版。为应付查禁，减少损失，有的干脆虚构出版社名称。例如《太阳月刊》被查禁后，于1928年10月改名为“时代文艺”继续出版，但仅出了一期，以后又改名为“新流月报”，1930年1月，该刊再改名为“拓荒者”继续出版。不仅是左翼文学杂志，当时出现的众多文学杂志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此类文化政策的种种不同反应而得以形成并呈现出的状况。与书籍相比，杂志要相对灵活一些，在审查中书籍遭禁，出版者、书店便满盘全亏，而杂志则可以用临时撤换一些文章篇目的办法，保住整个杂志。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期刊的特殊亲密关系，从更深层来看是由于杂志作为公众传播媒介对于各文学派别推行自己的文学观有重要作用，

① 胡道静：《一九三三年的上海杂志界》，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

② 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③ 朱晓进：《论三十年代文学杂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所以在当时办杂志的人多,文坛呈现一片热闹的景象。杂志为文坛的活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文坛的兴盛也促进了杂志的发展。1927年国民党“清共”之后,大革命风云消散。一方面,左翼知识分子从政治前线退居到文化幕后,将现实中的革命路线之争带入了知识文化领域。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办杂志来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当时的高压政治下得到最大程度的社会化,因此,在自办杂志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可谓百折不挠。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加强文化控制,除打压异己之外,也凭借政权的力量提出“三民主义文艺”口号,发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创办多种文艺刊物,但未能形成有号召力的理论,也缺乏比较像样的创作,影响力有限。而在叙述革命文学主旋律之外的还有其他文学群体如京派、海派,他们的文学刊物也呈现了多样的面貌。有学者这样描绘了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基本面貌:

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前者一般又称为左翼文学运动,以“左联”为中心,拥有一批发表园地……形成一种声势。这一时期的“左联”之外的作家无论在政治上与文艺上都具有不同倾向,本身也处于不断分化中:有的民主主义作家受到“左联”巨大影响和帮助,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盟军;有的自由主义作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国民党(但又不同于专门致力于国民党党治文学的作家),与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着矛盾与斗争。这些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没有“左联”那样共同的严密组织,未形成统一的文学运动,也没有像前一时期一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他们往往由于文学见解比较一致而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相近的作家,共同开展活动。<sup>①</sup>

民主主义文学延续了“五四”文学以来对于启蒙功用的重视,坚持着文学“为人生”“为平民”的观念。到了三十年代,老舍、巴金、曹禺等作家主要用“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创作思想基石,还有一些前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仍然秉持现实主义作家“人生派”立场的努力,如叶圣陶、王鲁彦、许地山等,使得民主主义文学在艺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日趋成熟。巴金等人更是凭借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文化生活丛

<sup>①</sup>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刊”“文学丛刊”“译文丛刊”等大型文学丛书，尤其是“文学丛刊”，历时14年，出版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86位作家的共计160册作品集，涵盖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杂文、书信、电影剧本等各种文体，内容丰富，销量颇佳，影响深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文学丛书。自由主义作家则侧重坚持思想自由的立场，突出文学是为个人的“自己的园地”，新月派的“人性论”“天才论”，林语堂的性灵文学以及京派对文学的非功利性、审美独立性的强调，都是自由主义文学的典型体现。尤其是京派，在三十年代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学价值，与当时主流的党派政治文学运动形成尖锐的对立。此外，在乡土和都市、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中，北方京派与南方海派的文学思想也是大相径庭。京派文学关注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希望用传统人文伦理来进行救治，所以它更乐于书写乡村的文明和生活，对城市则充满了讽刺。海派却敞开胸怀迎接与城市现代化伴生而来的各色欲望，现代派和新感觉派的文学都立足于上海这个大都市，兴趣盎然地描写都市风景，展示市民生活，揭示现代都市人的价值取向、复杂关系、寂寞心理等各方面，努力在现代主义美学与市民消费文学之间找寻契合点。与京派那种试图远离政治、商业的学院式人文气息浓郁的文学期刊不同，海派期刊有鲜明的商业性目的，且兼有一种文学的自觉的现代性追求。比较典型的有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期刊，其在顺应读者市场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先锋求新地使得各文学流派及作品多元共存，造就了“综合性的、百家争鸣的万华镜”式的现代传播园地，培植了日益成熟的现代派文学。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还有一类比《现代》更加注重商业性的文艺期刊——鸳鸯蝴蝶派的期刊。他们的创作旨在为人们提供茶余酒后的消遣，将文学的游戏娱乐、休闲消遣性放在第一位，表面上抛弃了文学的政治性，一头扎入商海里，一味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从言情、黑幕、历史、宫闱、武侠、侦探等各种题材中挖掘市民感兴趣的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礼拜六》周刊，因此鸳鸯蝴蝶派也有“礼拜六派”之称。20世纪30年代仍然活跃在文坛的有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周刊《红玫瑰》，严独鹤、周瘦鹃主编的月刊《中华》，许啸天主编的《红叶》（先是周刊，后改月刊）等。

三十年代的文学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下拉开序幕的，“五四”以来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和注重个体的启蒙思潮逐步消散，伴随着整个社会大变革的是，尚没有真正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日趋加强专权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民族危机更加严峻，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救亡图



存促使文学主潮变得空前的政治化。而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及审美立场,文学对于现实社会与文明的阐释方式也产生了很大不同,导致文学格局更加多元化,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三十年代的文艺期刊场域同样非常丰富活跃,许多文学流派都有自己代表性的出版物,诸如创造社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论语派的《论语》,现代派的《现代》,南国社的《南国月刊》等,都在利用期刊阵地发出自己的文艺之声。这一时期的文艺期刊出版带有更强的社会化生产性质,如果说“五四”新文学出版是在新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更多属于个人和团体的出版行为的话,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已经开始遵循着现代出版的客观规律,自觉地建构起文学的生成方式和体制,商业性的诉求日益明显且不可避免,而文学期刊的文化功能则在政治性、商业性的多重社会环境中需要不断地自我调适,冲突和平衡的情况在不断反复和互现,由此,造就了三十年代文艺期刊出版复杂而多元的活跃局面。刘增人在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中统计出,在《文艺月刊》创刊的1930年里,多达99种文艺刊物在这个年度创刊发行,我们从中选取比较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刊物,希望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共时态的类型比较中,进一步体会《文艺月刊》的独特魅力。

## 第二节 1930:“左”“右”对峙的新期刊

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等发起“革命文学”论争,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批判“五四”新文学,当时众多知名期刊如《语丝》《新月》等都被卷入论争,互相攻伐,上演一场文艺界话语权争夺大战,这场论争深远影响了整个三十年代文学格局。“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倡导与论争,不仅在思想上促成了文坛上的转向,而且为‘左联’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它成为了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序幕。1929年,中共中央通过江苏省委批评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于鲁迅的攻击,以及他们内部对立的错误,发出了停止同鲁迅论争的指示,并以创造社、太阳社为基础开始进行‘左联’的筹备工作。1930年3月,‘左联’在上海成立。‘左联’的成立使中国文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党开始了对于文学的直接领导,文学和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一翼。这使30年代文学具有一种特别的色彩,并且与其他时代的文学明显地区分出来。”<sup>①</sup>

<sup>①</sup> 卞新:《1928:革命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